

《英雄》之魂漫游东方,《命运》交响融入中华

“乐圣”贝多芬与中国

本报记者许晓青

110多年前,李叔同称他“比独芬”;鲁迅也提到他,叫“培得诃芬”,把他与康德、拉斐尔并列,还有人翻译成悲多汶、裴德芬、白堤火粉。而最终通过傅雷的经典译作,他在中国才被称为“贝多芬”。

在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内,陈列着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份交响音乐会公演节目单,上面恰巧就有“Beethoven”(贝多芬)的曲目。

这一天是1911年11月12日,按惯例一场“星期日音乐会”在上海市政厅举行。当时的节目单显示,在上半场压轴演出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的最后一个乐章。

这场演出距离贝多芬逝世已80多年,当时在现场的中外听众有多少人,反响热不热烈,后人不得而知,但“乐圣”贝多芬那时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被人所知。他的作品,尤其是交响乐作品后来广为流传,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和中国人发展,见证这个国度的现代化进程。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其作品在中国的大众传播已有一个多世纪历史。这些来自西洋古典乐殿堂的美妙音符,润泽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就好像译者傅雷在《贝多芬传》中所提及的那样,贝多芬和他的作品从“痛苦与斗争中解放了人,扩大了人”。

遇见“贝多芬”,他“连滚带爬”

1927年春,20岁生日尚未到来的谭抒真一头扎进了只有洋人参加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他起初只是想试试自己的身手,因为当时他的提琴老师刚好回国休假。他想,“要不去交响乐团拉琴试试”。

上海是西方古典音乐在华传播的“母港”,上海工部局乐队曾有“远东第一乐团”的美称,而工部局乐队的雏形——上海公共乐队,诞生于1879年,比柏林爱乐乐团的成立还早了3年。

谭抒真的这一试,使他成为第一名跻身西洋交响乐队的中国籍乐手。不过,政坛上无所作为的他,第一天进乐队排练,谱架上摆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我父亲就在这机缘巧合下‘遇见’了贝多芬,当时他实际上只有19岁,是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年轻人,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上海工部局乐队,第一天就要跟着大乐队拉‘贝五’(第五交响曲)。”谭抒真之子谭国璋在上海家中告诉记者。

因为胆子大、敢尝试,19岁的谭抒真敲开了通往西洋交响乐队的演出之门,也敲开了通往贝多芬庞大交响乐体系的门。

“因为之前我父亲就是自己拉拉琴,没有参加这样一个正规的乐队,乐队的巨大的声音,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非常响亮的声音,他过去耳朵里没有听到过。并且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拉交响乐,所以他觉得是‘连滚带爬’,那是没经过个人练习就当场视奏乐谱的状态。”

王兆鹏

南宋,是一个需要英雄也产生过英雄的时代。南宋初的岳飞,从小就想当英雄,最终成就了伟业和英名;南宋末状元出身的文天祥,压根就没想当英雄,最后却成为英雄;南宋中叶的辛弃疾,也是从小就想当英雄,可因为生活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成就“弓刀事业”。不过,政坛上无所作为的他,却在词坛上开辟了新天地,建立了丰功伟业!

就像人们熟悉范仲淹是文学家、政治家,却不熟悉他也是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一样,后人也大多只熟悉词人辛弃疾,而不太了解战战略家、军事家的英雄辛弃疾。值此辛弃疾诞辰880年之际,我们来仰望历史上这位悲剧英雄,了解他的战略思想、战略规划。

辛弃疾36岁时曾给南宋孝宗皇帝献御敌十策,题为《美芹十论》,开篇说:“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餘;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意思是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就先做出战略预判、战术预案,一旦有事发生,应对就从容不迫,绰绰有余;如果事发后再来仓促谋划应对之策,就难免仓皇失措,顾此失彼。辛弃疾仿佛预言家,能看到后人的困境,他在《议练民兵守淮疏》中强调:“事不前定不可以应猝,兵不预谋不可以制胜。”事先没有缜密的预案就难以应对突发的危机,打仗没有预谋就难以克敌制胜。

自我人生规划

辛弃疾的战略思想,包括个人的人生规划和国家的战略规划。英雄,总是以国家的战略目标作为个人的奋斗目标,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理想紧密相连。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仅是因为他的智慧勇气胆略的超群,而且在于他一生是为民族、为民众、为国家的共同愿望而奋斗。

辛弃疾的人生奋斗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恢复”——恢复中原,恢复失地,恢复故国,恢复一统江山。而这,也是南宋时代民族民众的共同愿望。

1140年5月28日,辛弃疾出生在“南共北,正分裂”的山东济南,属金人占领区。辛弃疾从小就深切感受到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所以立志当英雄,拯救被压迫被欺凌的同胞,实现国家一统,完成恢复大业。为了实现打败金兵收复失地的战略目标,

更让谭抒真没想到的是,第一天练“贝五”,他已是拼命跟着乐队“前进”,晚上回家自然猛练一番,第二天再坐到乐队里,以为还是“贝五”,却看到了“贝九”(第九交响曲,也称“合唱交响曲”)的谱子。谭国璋解释说,原来当时的乐队总是把最需要练习的曲目拿出来练,熟悉的曲目就略过,而对初入乐队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就这样谭抒真从拉贝多芬的几大交响名曲开始,“遇见”这位大师,此时距离贝多芬逝世已经100周年了。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1927年,谭抒真在排练后不久,就跟随乐团正式演出。1927年5月28日的《申报》上有这样的记载,名叫张若谷的乐评人写道:“乐圣贝多芬百年祭(一)明夜九时一刻在市政厅举行,一九二七年春季末次音乐会,谭抒真君加入乐队合奏提琴。”

这一记载与上海交响乐团现藏的1927年5月29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节目单逐一呼应,当天的演奏包括“贝九”部分选段和“贝五”,以及贝多芬的第二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热情》。

“当时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个中国人是谁,因为这件事情在中国讲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全部是外国人的乐队,一个中国人加入。那么也为演出增加了很多中国观众。”谭国璋说。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尽管战乱不断,但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持续传播,上海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等,开展各类小规模室内乐教学和演出,贝多芬的曲目总受到乐队和受众的青睐。

见证战争与和平:他的音乐里并非只有“斗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市级交响乐团的建制得以保留,第一任市长陈毅也是交响乐的知音。有口述回忆史料显示,陈毅对贝多芬情有独钟。

南征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懂得欣赏交响乐。不仅是陈毅,贝多芬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被大量演奏。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介绍,1949年10月16日,富华指挥乐队上演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次上演贝多芬交响作品。1952年至1953年,贝多芬专场音乐会屡屡出现在上交节目中,傅聪、沈枚等担任独奏。

195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隆重纪念贝多芬逝世130周年,文艺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1959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在北京演出,这部鸿篇巨制的合唱交响曲,包括经典的“欢乐颂”,首次全部由中国人演唱,成为贝多芬作品传入中国的一大里程碑事件。同年,德累斯顿交响乐团访华,告别演出选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由波恩格茨指挥前三乐章,严良堃指挥第四乐章,中央乐团、中央乐团合唱队、中央广播乐团合唱队和中央音乐学院学

他青年时代两次随计吏到金朝腹地侦察地形形势,了解虚实,掌握情报,等待机会,起兵抗金。

机会终于等到,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冬,金主完颜亮率领百万兵马,南下侵宋,导致北方兵力空虚。而完颜亮出兵前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强令汉民族百姓提前预交五年的租税,早被盘剥一空的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民怨沸腾,义勇之士纷纷起兵反抗,海州魏胜、密州开赴、齐州耿京、魏州王友直等都揭竿而起。辛弃疾也率众两千,投奔耿京部下,很快得到耿京的信任,担任掌书记,与之共“图恢复”大业。不到半年,义军就快速扩充到25万人。辛弃疾的恢复大业,有了一定的战略资本和军事基础。

可是风云变幻无常。完颜亮率部攻渡长江,在采石矶遭南宋军队的迎头痛击,自己被部下乱箭杀死,金兵主力部队全部撤回北方。新登基的金世宗对义军下达大赦令,明令“在山为寇,下山为民”,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导致北方义军纷纷溃散。耿京所部,已是独木难支。年仅22岁的辛弃疾,敏锐地觉察到部队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建议耿京率部投奔南宋。耿京言听计从,委派副将贾瑞和辛弃疾在建康向宋高宗赵构陈归朝之愿,受到高宗的嘉奖,耿京和部下全都封官。辛弃疾一行兴冲冲地赶回山东,向耿京复命。行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时,忽接情报,得知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25万军队已土崩瓦解。原来积聚的他在《美芹十论》中回忆:“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负抱愚忠,填郁肠肺。”未来的人生道路该如何走?如果继续留在北方,已全然失去了抗战的社会基础,孤掌难鸣,恢复大业没有任何希望;如果回归南宋,原来有25万军队作投名状,现在赤手空拳回到南宋,凭什么政治资本获得南宋君臣的信任?他将做出怎样的战略决策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变故?真正的英雄,不仅能循常,更善于突变。辛弃疾做出惊天地的决断:亲率身边仅有的50人马,奔驰到坐拥五万之众的山东金兵军营中,活捉叛徒张安国,献给南宋行在,以彰显他过人的智慧勇气和胆识!

在冷兵器时代,要以一当千,由50名壮士到五万兵力的敌营中生擒叛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辛弃疾心目中,“天下无难能不可为之事,而能为必可成之人!”(《美芹十论·久任》)作



▲日前,国家大剧院“贝多芬生平与艺术展”上,名为《命运之火》的金属丝塑像。

本报记者李牧鸣摄

生合唱队登台与德方合作演出。这场中德合演的“贝九”吸引上万人现场聆听,盛况空前。

音乐学家、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韩斌认为,贝多芬在中国得到知识阶层的崇尚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这与贝多芬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也与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广为传播有关。贝多芬的作品也象征着“燃烧的革命之火”,通过丰子恺的介绍,“英雄”成为贝多芬的代名词,引发更多共鸣。

新中国成立后,贝多芬成了革命音乐的代表。韩斌分析:“贝多芬的音乐唤起那种对平等的向往,对斗争的渴求,对胜利的欢呼,这都得到了充分认可。他的斗争精神,他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给人以发愤的精神动力。这是那个时代很难得的一种文艺力量,一种精神上的推进剂。”

“贝多芬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音乐家。他的音乐,不是单一的,比如说贝多芬有很强的‘斗争性’,他对命运不公有这种表达。而实际上他的人格是多面的,丰富的。”出生于1940年的谭国璋从小跟随父亲谭抒真学琴,耳濡目染,经历了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他的心目中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贝多芬。

身为国家一级演奏员的谭国璋认为,其实贝多芬的精神世界很丰富,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他各种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都很丰富。“单看交响曲,除了‘贝五’,我们拉‘贝六’(田园交响曲),他对自然风光的表达,就包含了对大自然的整体性认知,而不仅仅是‘斗争’。”

“固然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最为知名,但同时欣赏他要从多面切入,比如奏鸣曲、协奏曲等,懂

挑灯看剑原是醉里 吹角连营只在梦中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将帅之才辛弃疾

为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军事家,辛弃疾绝不会与敌人硬拼,大张旗鼓地强攻进入金人营地。他在《美芹十论·察情》中说:“古人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意思是说,真正善用兵的人,不是追求每战必胜,而是将本来不可能打赢的仗,经过精心的谋划,使之必胜。他又说:“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馀矣。”“事有操纵在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可以推想,辛弃疾到山东后,必定是先侦察敌情,了解金兵防守的薄弱环节和松懈时机,熟悉地形地貌,掌握金兵的活动规律后,制定出万无一失的突击方案,然后一举而成。终将张安国“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兔耳,束马衔枚”(洪迈《稼轩记》),昼夜不停,千里奔袭,将张安国送到临安正法。

辛弃疾这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成功打响了回归南宋的名声,拼搏出了未来仕途的政治资本。洪迈《稼轩记》说,孝宗皇帝闻知壮举后,召见了辛弃疾,赞赏有加,从此加深信任,所谓“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

辛弃疾回到南宋后,仕途虽不如预期,但总体上还算顺利,38岁就做到地方帅臣,任荆湖北路安抚使。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近20年后,善于洞察社会发展方向的辛弃疾,已经预感到仕途上的政治危机,可能会被踢出官场。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正当42岁的盛年,在南昌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他就为自己做好了罢职闲居的人生规划,在上饶城北带湖边上买了一块平坦的土地,构建屋舍园林。

辛弃疾精通园林建筑设计规划。他买的地块,约有150亩。他亲自设计,分成三个功能区,一为生活区,建筑房屋,占地十分之一;二为休闲区,在东风、西阜、北墅、南麓四面,修竹径,辟花蹊,修水池,建亭阁;三为作物区,种植粮食果蔬,自给自足。设计好后,命名为“稼轩”,画上图纸,请著名作家洪迈写《稼轩记》。

果不其然。当他还在犹豫是否主动退隐闲居田园时,朝廷就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他的官职,规划的稼轩变成了实际居住的田园,而且一住就是后半生。

军事的攻守战略

辛弃疾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具有超强

贝多芬的人逐渐增多,是与中国不断发展的音乐教育有关,这也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过程。”他说。

谭国璋在对父亲生平的研究中还发现,父亲曾师从多位老师,最后一位是二战时期到上海避难的犹太音乐家卫登堡,卫登堡又是音乐家约阿希姆的学生,师徒一脉相承,把欧洲演奏传统,特别是对贝多芬作品的见解和演奏风格传授到中国。谭国璋还收藏着父亲留下的一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乐谱,上面修改、添加的弓法、指法,都是卫登堡根据他的老师约阿希姆的演奏标注记录下来的。

“卫登堡把演奏技巧传给了我父亲,还传给了陈宗晖、马思宏等在上海的提琴家。这样口传心授,贝多芬的作品自然从欧洲逐步进入中国、融入中国,主要的‘登陆点’,就是上海。”谭国璋说。

谭国璋还记得,父亲在90多岁高龄时仍不满足于一个人拉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还约了弹钢琴的朋友,一起到友人家中合奏,老人们为了贝多芬不辞辛苦,追求心灵上的满足。

“吃”音乐“包子”的爱乐青年:

贝多芬就是大海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幅增加,交响乐重新回到了广播里、舞台上。新一波“贝多芬热”很快来到了,音乐界认为,这是中国交响乐的一次“再觉醒”,堪称“复兴”。

据记载,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上演第五交响曲《命运》,标志着西方交响音乐重新回到中国内地舞台。1978年,著名指挥家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1982年,法国著名指挥家让·皮里松来华,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第九交响曲,异常轰动。1983年,中央乐团在北京,由李德伦、严良堃、陈燮阳、韩中杰等分工指挥,探索在短时间内集中演奏贝多芬的“九大交响”。

1985年,贝多芬诞辰215周年之际,上海交响乐团筹划了盛大的纪念音乐会,演出从9月一直持续到12月底,3个多月里上演了贝多芬“九大交响”,这也是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第一次完整地呈现于上海舞台。

上海观众通宵排长队购票,队伍把上海音乐厅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这一系列音乐会共8场,分别由黄贻钧、曹鹏、陈燮阳接力指挥。排队人群中就有“60后”乐迷刘蔚,当时他还只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

“我没有通宵排队,是选择一个中午去的,也排了很久。”如今已是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副会长、译文出版社营销部负责人的刘蔚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外国文艺处于饥渴状态。上海交响乐团1985年的三大指挥接力执棒贝多芬全套交响曲,是乐坛罕见的盛宴,让大家

真正‘解渴’。”

20世纪80年代,唱片市场仍未完全复苏,刘蔚这样的青年爱乐者主要依靠录音磁带和广播听贝多芬。“当时感觉贝多芬的作品,神秘而又有些难以亲近,但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田园交响曲,很好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988年6月至7月间,陈燮阳携上海交响乐团上演贝多芬全套交响曲,此后直至新世纪,贝多芬变成青年乐迷的“老友”了。同时贝多芬也成为中国各地交响乐团迈向成熟的“见证者”,包括上海交响乐团在内,更多中国乐团通过演绎贝多芬的曲目,走向世界。

2007年上海交响乐团又策划演出“完全贝多芬”系列,再次重现经典,完整地献上了贝多芬的“九大交响”,并录音发行。这一类成套的作品,就被乐迷称作“包子”。刘蔚幸运地得到了陈燮阳赠送的、他亲手执棒指挥的这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音乐“包子”。

音乐“包子”,指的是各大唱片公司以某个专题,或以某个音乐家为系列而制作的套装唱片集。这些唱片少的四五张,多则五六十张,乃至上百张。它们都放在一个盒子里,形似“包子”,乐迷们昵称其为音乐“包子”。

刘蔚那时已是古典音乐的资深乐迷,他自称是爱“吃”音乐“包子”的青年,认为听贝多芬只听“九大交响”是不够的,最好是认真听“全本”,那才是“骨灰级”乐迷。

在刘蔚手里有几个特别令他自豪的贝多芬“包子”,比如,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由克路易坦指挥法国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协奏,刘蔚早年在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节目中听过,非常喜欢。后来在唱片店也看见了CD,但一犹豫没买,后来却走遍上海各家唱片店没了踪影。“直到20多年后,我才从一家英国古典音乐网站上发现一个音乐‘包子’——EMI的50CD贝多芬全集,其中就有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克路易坦指挥柏林爱乐演出的贝多芬全套交响曲,这成为我收藏的贝多芬‘包子’里最珍贵的一部分。”

刘蔚说,贝多芬曾赞美巴赫“他不是小溪(Bach,德语的另一层意思,即小溪),是大海”,那么贝多芬本身又何尝不是大海,贝多芬的音乐像大海一样博大精深,斑斓美丽,风光无限。

2020年,全球各地隆重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又逢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考验,上海交响乐团通过“云直播”再度奏响贝多芬,包括室内乐、奏鸣曲等,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又多次上演贝多芬作品。

当上交推出的贝多芬文创作衍生品出现在B站和抖音上,刘蔚等古典音乐爱好者也会关注。他说:“贝多芬在这个时代的传播,是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人性的光芒,面对疫情,我们更需要这种尊重生命、又超越生活的精神追求。”

辛弃疾多次向朝廷提出防守淮河、荆襄的具体方案,并在《美芹十论·详战》和《九议》中详细陈述了攻取山东、进而收复中原的战略战术。具体进攻方略是,主力部队由沭阳(今属江苏)出兵,攻取山东。进攻开始前,虚张声势,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金人的重兵,驻守在关中、洛阳、开封三地,防备严密。南宋军队则分别在川蜀、襄阳、淮西三地,耀兵扬威,摆出一副进攻关中、洛阳和开封的态势,多用旗鼓造成志在必得之势。关中震恐,洛阳震惧,开封震动,金人必然会以十万之师聚集三地以防守,并调集燕山的卫兵、山东的户民和中原的签军等精兵锐卒至开封、洛阳守备,我军仍然虚张声势进攻三地,使来增援的军队既不能离去,也得不到休息。这样一来,山东就变得空虚,虽然还有数千兵力防守青州、密州、沂州、海州,我军则派沿海战船,在登州、莱州、密州边境来回驰突,山东的数千守军必然会分散布防,从而失去有效战力。山东虚空之后,盗贼会乘机而起,我军再诱群盗之兵四处骚扰金人守军。趁山东兵力空虚而混乱之际,我军再择派一骁将率兵五万,步兵骑兵各半,进击山东。三日之内,就会攻取兖州、郛州,进而控制山东全境。拿下了山东、河北、山西可指日而下。等到关中、洛阳、开封三路金兵北撤回国,我军已断其归路,他们又担心川蜀、襄阳、淮西三路之兵进攻,也不敢贸然退师。

辛弃疾又提出,海道与川蜀、襄阳、淮西三路之兵为正,而夺取山东之兵为奇。奇兵需精强,正兵可稍弱。以弱者为牵制之师,而强者为必取之兵。虚实就虚,战而必胜。作战方略计划,周详切实,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可惜的是,辛弃疾提出的多项“恢复大计”,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更未实施。他清醒地意识到,“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盖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醒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九议》)正因为辛弃疾看到了恢复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却得不到理解和支持,所以,他一生感到特别的压抑和痛苦。他的痛苦,是为苍生、为民族。无论是罢职闲居,还是在任为官,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社会责任、家国情怀、英雄使命。